

偏見的政治

——讀《蘇北人在上海》

● 錢霖亮

韓起瀾的《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從社會建構論的視角出發，來探討她所認為的「蘇北人」這一族群是如何在近現代上海的社會歷史情境中反覆建構和延續的。



韓起瀾 (Emily Honig) 著，盧明華
譯：《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在學術界，以「族群」(ethnicity) 取代「人種」(race) 的概念，作為一種理論視角來審視人類社會當中不同社會集團的差異，大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在西方的族群

研究中，存在一個巨大的爭議，即族群是甚麼，是如何產生的？

這個爭議在「族群」概念產生之時即出現，並一直處於族群研究漩渦的核心。參與爭論的一方認為，族群是社會化的建構，是在一定歷史情境裏，不同社會集團於特定的政治、經濟結構中競爭角逐妥協的產物。這種社會建構由此是富有伸縮性的，會依據情境之不同自我調適。從較長的歷史時段中來看，建構族群的核心與邊界本身即是一個充滿變化的歷史過程。我們可以稱這種看法為「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與此爭鋒相對的另一方，即「本質主義論」(essentialism)，則將族群視作先天產生的生理或心理特性，不為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所改變。

這兩大理論思潮同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中角逐。在後者的範圍內，尤其在諸如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中，社會建構論似乎逐漸佔據了主流，成了討論族群的社會和文化問題的一個基本立足點。韓起瀾 (Emily Honig) 的《蘇北人在上

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引用只註頁碼)亦從社會建構論的視角出發，來探討她所認為的「蘇北人」這一族群是如何在近現代上海的社會歷史情境中反覆建構和延續的。

自近代以來，上海的城市場域一直是關注中國的西方觀察家和歷史學家青睞的凝視主題。這些西方觀察視角下生產出來的研究文本，集中於對這個城市特殊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政治結構與事件的考察，可謂汗牛充棟。但在如此眾多的研究之中，韓起瀾認為對城中居民的社會差異的探討仍是相當有限的。已有研究更多地關注階級差別和性別差異基礎上的不平等乃至衝突的關係，而對基於籍貫造成的社會差異則着墨甚少。

作為歷史學家的韓起瀾選取了其中一個個案，即上海人對「蘇北人」的偏見為研究主題，同時運用歷史學和人類學的視角，來考察上海這個移民城市中一個特定移民群體的歷史經驗，並試圖揭示身份、偏見和社會矛盾的產生根源，即「蘇北人」作為一個族群是如何在上海的都市歷史社會條件下被持續建構起來的。

本書的導論點明了研究主題及其意義，闡明了作者所使用的族群理論和概念的意涵，回顧了西方和中國社會中族群研究的一些基本文獻。在此之後，她也對上海都市歷史與環境，以及定居其中的本地人和各類移民，尤其是「蘇北人」的基本狀況(包括人口、居住格局、就業機會、文化活動和社會地位等方面)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在本章

的最後，作者也介紹了她的研究方法和使用的材料。

自第二章開始，作者首先討論上海人／江南人口中的「蘇北」所指涉的地理區域。她指出，這個名稱的確指向一個地區(而不是一個省或者縣)，但這個地區與其說是一個客觀存在，毋寧說是一個被想像出來的區域——它的地界和內核都極富爭議。於是，作者傾向於將其視作對一個特定地區的地理、文化、語言和經濟同質性的想像。為論證這一觀點，她依次從地理、語言和文化標準來探討，最終歸於經濟和移民的視角上，總結出作為想像之地域的「蘇北」，是相對於「江南」的一個時空性質的象徵／信念，而這個象徵／信念的生產過程理應回歸到以上兩者的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去，回歸到「蘇北」移民和「江南」在地者長期互動的歷史中去。

一個顯著的例子即「蘇北」這個名稱在清代中期以前並不存在。清中期以降，直至十九世紀，隨着上海工商業的崛起、大運河在國內經濟貿易活動當中的功能式微，以及黃河改道造成的災害，改變了江蘇北部地方的經濟狀況並使大量移民流落遷徙到上海和上海周邊的地界時，在地者和移民的長期互動生產出諸如「蘇北」、「蘇北人」這樣附着貶義的標籤。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強調，要理解這些標籤生成的背景，我們需要回到移民來源地和到達地之間懸殊的經濟發展水準這一更大的歷史脈絡；而移民與在地者互動的歷史尤其重要地揭示出，有關「蘇北」的地域界定源自於描述移民人口的需要，因此這個名稱

作者首先討論上海人／江南人口中的「蘇北」所指涉的地理區域，指出這個名稱的確指向一個地區，但這個地區與其說是一個客觀存在，毋寧說是一個被想像出來的區域——它的地界和內核都極富爭議。

通過展示底層工作和生活如何持續地製造、鞏固對「蘇北人」的偏見、偏見如何限制「蘇北人」的就業機會、被限制的就業機會又是怎樣使新來的「蘇北人」繼續淪落在底層工作和生活，作者勾畫出幾個代際的「蘇北人」在生命機遇上的惡性循環。

所指的地域具有含糊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三章深描了「蘇北人」作為上海或者江南移民遷徙和定居的動態歷史，同時也細心挖掘了遷移地原有定居者和政治、社會機構處理與對待這些新移民的態度及方法變化的歷史(以棚戶區和文化活動的爭奪為個案)。從這種互動的社會關係乃至社會衝突中，作者認為在地者業已形成對「蘇北人」的偏見，但那些被認為是「蘇北人」的群體自身，卻並未接受這個一元化的標籤。相反，他們可能形成基於來源地地方主義的群體意識，以及作為棚戶區移民的一種共識。

為了論證族群可以作為「蘇北人」區別於其他社會集團的一個標準，同時也說明在地者製造出來的關於「蘇北人」的流行偏見的作用，第四章對這群移民的就業情況進行了詳盡的考察。作者留意到上海勞動力市場當中跟族群有關的職業分工，譬如「蘇北人」大多從事社會地位和收入都較低、與體力勞動有關的工作，如人力運輸(黃包車、獨輪推車)、貨物搬運和服務性行業(理髮師、澡堂工人、皮匠、掏糞工和掃垃圾工等)，基本上處在整個社會職業分層的最底層。很少「蘇北人」有機會進入製造業；即使能夠進入，也大多是一些只需基本技能、只提供最低工資，或工作環境相當惡劣的行業，而且通常只是作為臨時性的僱傭，經常會受僱主虐待。至於從事賣淫業的「蘇北」女性，她們也通常是被拐賣來的、被迫出賣身體的低級性工作者。除此之外，更多的「蘇北人」從未正式進入勞動力市場，而淪為乞丐和犯罪份子。

這個族群在就業生活上的惡劣狀況，在與其他群體的比較後，塑造並持續鞏固了在地的上海人／江南人對他們的偏見，而這偏見反過來又限制了「蘇北人」的就業，使他們失去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

不僅於此，作者還在本章接下來的篇幅中，轉向討論其他迫使「蘇北人」從事底層工作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私交與同鄉關係的局限。對於後來的「蘇北」移民來說，負面因素是長期積累的過程。江南人長期控制政治領域，並在經濟領域中佔據高端行業，這使先到的「蘇北人」在缺乏技術資金和社會網絡的條件下未能進入上述領域，而後來的「蘇北人」也就無法仰賴與前人的私交或同鄉關係獲得較好的工作機會，反而再次被引導進入那些「蘇北人」沉積的行業中，於是幾個代際的移民都只能生活在上海社會的底層。通過展示底層工作和生活如何持續地製造、鞏固對「蘇北人」的偏見、偏見如何限制「蘇北人」的就業機會、被限制的就業機會又是怎樣使新來的「蘇北人」繼續淪落在底層工作和生活，作者為我們勾畫出長歷史時期內幾個代際的「蘇北人」在生命機遇上的惡性循環。

在地的上海人／江南人業已形成對「蘇北人」作為同質性群體的偏見，那麼所謂「蘇北」來的移民是否認為他們自己構成了一個有內聚力的、有共同身份的集團？作者在第五章中即探討「蘇北人」的自我認同問題。她通過對幾個二十世紀最初十年出現的號稱是「蘇北人」的同鄉會的考察指出，用移民組織的出現來解釋共同族群認同的出現是值得懷疑的。實際上，這些組織很多並

不是「蘇北」移民建立的，而且通常存在時間非常短，內在的凝聚力亦非常脆弱。更多的同鄉會是以地方（通常以縣為單位）為基礎，只能說明地方主義的持久性。

作者進一步的探索發現，實際上在「蘇北人」的內部，在地方與地方之間同樣存在着偏見，比如「蘇北」區域的南部人對北部人就持有輕蔑的態度。這種內部分歧，與上海人／江南人和「蘇北人」的差異一樣，在文化活動、居住格局、職業分工等方面都有具體的表現。由此作者主張所謂統一的「蘇北人」認同存在的可能性並不大；相反，這些移民更傾向於強調自我的屬地（地方）認同，以此來回應和抵制在地人群污名化的標籤，他們並不是上海都市族群身份建構過程中的被動參與者。

第六章講述了一個特別時期內的「蘇北人」的身份政治。作者發現在1932年日本進攻上海期間，「蘇北人」的身份問題開始被高度政治化了——作為一個群體，由於其中的一些人被認定與日本人勾結，使得「蘇北人」的群體形象更顯負面。與此同時，這些被貶低的移民開始比以往更明確而激烈地反對加諸他們身上的污名化標籤，尤其是戰時「江北漢奸」這個政治化的標籤（頁89）。在作者的研究中，我們似乎可以察覺到移民內部抵制污名化策略的改變，至少是在移民精英中間，似乎有一種「蘇北人」的群體認同暫時形成了。精英們強調群體認同的行為，在作者看來是一種反擊偏見和敵視的策略；一旦情況得到紓緩，這種群體認同便會煙消雲散。另一方面，對於非「蘇北人」的

上海人／江南人來說，將身份認同問題政治化、將敵對人群污名化，是在特殊時期解脫自我罪責的有效手段。

第七章討論了1949年以後上海的「蘇北人」作為一個族群問題的斷裂和延續。這一時期界定「蘇北人」的標準改變了，因為共產黨政府的戶籍控制政策使人口的自由流動成為歷史。傳統「蘇北人」族群的再生產主要依靠定居上海的移民人口的再生產，而要區別這些代際上新的「蘇北人」和非「蘇北人」，只能倚賴說話的口音。另一方面，共產黨統治下的上海，很多來自江蘇北部的黨員被任命為官員和幹部，從而使新的「蘇北人」群體中也擁有了上層精英。但本地人對「蘇北人」的偏見在這一時期依然延續，無論在語言和大眾文化上，還是在婚姻和居住格局等方面都有所表現。

然而從「蘇北人」的回應上看，作者發覺，那些「蘇北」的移民和他們的後代似乎開始承認「蘇北人」這個社會類別，但是否將它作為自身認同則出現了看似兩極的分化。有些移民及其後代盡量掩飾他們「蘇北人」的痕迹，比如在與外人接觸時不講江北方言；也盡量不吐露出地方口音；盡其所能地與「蘇北」文化脫離關係。與此相反的，有些人則並不反駁「蘇北人」的標籤，但抵制它的負面涵義；他們認同自己作為「蘇北人」並由此產生自豪感，下決心維護這種文化認同，並尋找和傳播「蘇北」和「蘇北人」的積極印象。

在本章的最後，作者試圖解釋為甚麼在一個強調平等的共產黨社會中對「蘇北人」的偏見會延續下來。她從「蘇北」移民後代的受教育

作者主張所謂統一的「蘇北人」認同存在的可能性並不大；這些移民更傾向於強調自我的屬地（地方）認同，以此來回應和抵制在地人群污名化的標籤，他們並不是上海都市族群身份建構過程中的被動參與者。

作者呈現了「蘇北人」這個群體內部複雜的多樣性特徵。難道「上海人」／「江南人」沒有複雜的多樣性，就是鐵板一塊嗎？尤其是他們在對待「蘇北人」的問題上，作為一個群體，內部完全意見一致嗎？

情況、生活環境和就業情況入手，指出產生「蘇北」族群的社會、經濟結構仍然在延續，「蘇北人」仍在上海地方文化和經濟上處於邊緣地位。

本書的最後一章回歸到關於族群理論的探討。作者強調「籍貫」在近現代上海的情境中是「族群」涵義的承載者，它可以是上海都市中不同人群用來建構社會差異和等級的工具。將「蘇北人」理解成一個族群的建構，才能呈現出以籍貫為邊界的社會不平等結構和社會分化的過程。根據作者的說法，事實上，「蘇北」和「蘇北人」都不存在，它們是由江南人建構出來的，為的是捍衛他們的優越感。而在「蘇北人」的標籤之下，這些「蘇北」移民也不是被動的行為體，他們的內部也在分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不同的方式來回應上海人／江南人的他者建構。作者以此強調以西方族群理論來觀察中國社會，可以凸顯出傳統研究中被遮蔽的一些問題，尤其是可以揭示出理解中國的籍貫作為社會歷史建構的重要性。

在本書中，作者令人信服地使用「蘇北人」的個案來闡述族群作為一種區分人群的方式，是如何在特定歷史社會情境中利用一些元素（比如籍貫）加以實現的。對讀者而言，同樣重要的是，這個長時間段的具體歷史個案研究，向我們展示了文化偏見是如何形成並在歷史進程中如何得以延續的。這對於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不同人群在更大的範圍內相遇並進行經濟、政治和文化互動的過程以及結果，提供可參考的理解途徑。然而，瑜不掩瑕，筆者認為本書亦有相當多的不足之處，以下將一一提出疑問。

首先，在本書中，作者輪換使用「上海人」／「江南人」或者「江南精英」這樣的詞彙來描述與「蘇北人」相對應的人群。作者對「蘇北人」這一富有爭議的概念做了梳理，但並沒有事先界定誰是「上海人」、「江南人」、「江南精英」，以及他們之間又是怎樣的關係。同樣地，作者的研究呈現了「蘇北人」這個群體內部複雜的多樣性特徵，這可能會使讀者感到疑惑——難道「上海人」／「江南人」沒有複雜的多樣性，就是鐵板一塊嗎？尤其是他們在對待「蘇北人」的問題上，作為一個群體，內部完全意見一致嗎？

與此有關的是，既然作者認為「蘇北人」的族群建構過程和有關這群人的偏見，主要是伴隨「蘇北」移民到上海後與「上海人」／「江南人」互動後產生的，那麼偏見其實是族群之間競爭的策略和結果。有關「蘇北人」的移民史，作者可以遠溯到明清時期，然而對那些沒有清晰界定的「上海人」／「江南人」，他們是否也有遷徙的歷史，有的話又是怎樣的？尤其在第三章談到「蘇北」移民在找工作時與「江南」移民的比較劣勢，作者本可以更為深入地討論在具體找工作的過程中，「蘇北人」與從「江南」來的新移民之間是否有直接的互動，以及他們又是怎樣看待對方；特別當這些「江南」移民並不一定是「精英」（所以如何界定「江南精英」是非常重要的）時，兩群同樣在他鄉、同樣在找工作的底層人如何處理相互關係。這樣的探討將展示歷史本身的複雜面和生動的細節。

同樣是人群分類的問題，本書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一個發現，是

所謂「蘇北人」內部的分化與衍生的偏見。在面對「上海人」／「江南人」強勢的偏見時，「蘇北」南部人可以調適他們的認同，歧視來自「蘇北」更北地方的人。然而，作為讀者，筆者十分想知道的是，接下來「蘇北」北部的人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尤其是那些「蘇北」最北的移民，他們對來自「江南人」和「蘇北」南部人的偏見，又會做出怎樣的回應。但是這些在作者的研究中卻是找不到的。

作者在導論和結尾的章節都談到上海都市的社會結構，其中也涉及在滬的外國人。毫無疑問，這些人在近代中國，尤其是近代上海都市的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作者也承認這點，比如在導論中，她提到「蘇北人的貧困落後不只是以中國精英集團的標準來衡量，而且還用外國的標準來衡量」（頁11）；「殖民主義為蘇北人類別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背景，外國人有時成為建構這個類別的活性媒介」（頁12），等等。然而，除了在第三章關於棚戶區的爭奪中，我們偶爾能看到租界政府和某些精英人士的活動外，作者的研究基本上忽視了外國人在上海都市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具體角色和發揮的作用、他們的介入或不介入（但存在）對上海都市的族群結構有何意義，以及其他相關的問題。筆者以為這是本書最大的缺漏。

與先前章節的歷史情境不同，本書第七章討論的是社會主義時期的「蘇北人」族群問題。筆者理解作者寫作這一章節的問題意識在於探討：為何在共產黨國家強調人人平等的口號下，基於籍貫差異而存在的偏見依然得以延續。這樣的省思

是非常必要的，作者也對偏見產生的原因做了傑出的討論。然而，從1949到1980年間，時間跨度依然很大。儘管籠統上說都是社會主義體制，但作者談論的很多造成影響的具體機制在最近的三十年間也有很大的變動。

尤其重要的是，筆者希望看到作者討論的這些有影響的具體機制和國家宣傳的平等話語之間有怎樣的互動與張力，而參與到偏見消除和偏見重構兩個並行過程當中的代理人（agents）和行動者（actors）又是怎樣來處理這之間的張力的；而不是像作者這般簡略地、僅僅是說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存在着族群偏見這一事實和它產生的一些靜態的原因。如果我們能夠回到動態的歷史中去，我們可能會發現，偏見的生產與再生產也許不僅是歷史的簡單延續和現有機制的靜態產物，它們可能與作者描述清末民國時代的偏見一樣，一直隨着社會主義社會情境的變化而變化。

回顧全書，用長歷史看族群身份建構與變遷的困難或許也正在於此。作者用不過百頁的篇幅（中譯本正文共117頁）描述了近一百三十年中國近代史中一個族群的演變歷程；而塑造這一歷程的宏大社會背景更是紛繁複雜，其中涉及的歷史行動者又多種多樣，這些都對作者掌握的研究素材和視野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也為如我輩後學者思考長歷史的社會文化變遷發出了一個警示的信號。

錢霖亮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研究生

作者的研究基本上忽視了外國人在上海都市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具體角色和發揮的作用、他們的介入或不介入（但存在）對上海都市的族群結構有何意義，以及其他相關的問題。筆者以為這是本書最大的缺漏。